

絲路上的瘟疫

文・圖／李弘祺

現在美國差不多所有的教科書都說黑死病的起源是因為蒙古軍隊打進了雲南，破壞了該地本來的生態平衡，結果染上了「鼠疫」（現在很多學者認為老鼠本身不是帶原者，而是牠們身上的寄生蟲），並把它帶出來，從而散播到中國中原，又傳染到中亞、歐洲。這種說法與天花傳入並在美洲流行的歷程非常相似，因此西方學者很容易接受。

第一個提出前述黑死病說法的是名史家麥耐爾（William McNeill），他生前與何炳棣交好，也是同事。很可能是何炳棣提供他一些有關中國歷史上的天災人禍的資料，於是麥耐爾就猜想會不會是蒙古軍隊把它帶出去的。這個說法見於他的名著《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s*, 1967），不過他沒有表示這是何炳棣告訴他的。他倒也很誠實，承認這是他的假定，並說需要進一步考察看看中國在蒙古人征服雲南（大理）之後（1253）其他地方有沒有爆發「傳染病」的記錄，因為這樣才好證明他的說法。就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中國人仔細爬梳文獻提出正反的證據。不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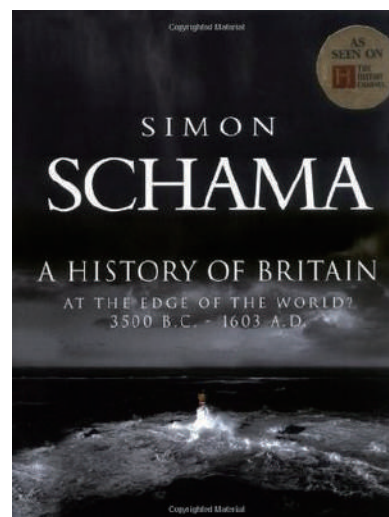
蒙古時代的絲路。黑死病可能跟著蒙古軍隊經過絲路傳進歐洲。



忽必烈帶軍攻打大理國。



2012年，作者與寫作《瘟疫與人類》的麥耐爾合影。



夏瑪寫的《不列顛史》：夏氏認為匈奴人把死的牛羊放進溪水，以毒害喝水的敵軍。

記得他在書中是引述了陳高備主編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939）這本中文書。

現在，鼠疫是蒙古人從雲南帶出去的說法已經普遍為學者所接受，寫進了世界史的教科書。事實上，有的教科書還說中國文獻記錄早從先秦或秦漢時代就已經有鼠疫的記載，更說霍去病是因為喝了帶有瘟疫病菌的水而死的。各種癘、疫的記載早在中國先秦文獻已出現，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我倒是第一次讀到霍去病是死於瘟疫的說法。原來在中文著作裏，霍去病因得瘟疫而死的說法也是近年來才出現。在西方，這個說法倒已流傳了一段時間，例如上世紀非常有名的威爾斯（H. G. Wells）在他的《世界史綱》裏就提到過。近來因為史學家夏瑪（Simon Schama）在公元2000年出版的《不列顛史》（*A History of Britain: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現代電視影劇中的霍去病。



蒙古軍隊圍攻喀發，用拋石機把死人屍體拋進城內，毒殺敵軍。



黑死病：文藝復興時代。

3000BC–AD1603, p. 226) 再一次提到它，使它又重新流行了起來。在中國的正史裏，確實有匈奴人「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敵）軍」的說法。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已經有記載（《漢書·西域傳下》），不過中國的史書倒是沒有說霍去病就是中了瘟疫而死。

第一次在戰場上用拋石機把死病人的屍體拋入敵營的記載，確定可靠的是發生於1347年。當時蒙古人包圍了黑海邊的大城喀發（Caffa, 現在名Feodosia，在克里米亞半島上面）。據當時人的記載，蒙古軍隊採用這樣的戰術，造成了上百萬（千萬？）人死亡，引發空前的恐慌。蒙古人打進雲南（大理）早在1254年，而喀發的圍城則是在1347年，兩者相差近一個世紀，因此這個連繫顯得十分薄弱。雖然從1254年到1347年，中國史書記載有多次的疫病（很容易在史書的五行志找到記載），但是這些記錄太過簡單，很難作為嚴謹的第一手證據。至於說生物戰的起源是匈奴人，並且還害死了中國歷史名將霍去病，這樣的「故事」說起來固然津津有味，但是很難確定它是歷史的事實。

順便說一句，包圍喀發並使用拋擲死體來引發瘟疫的是蒙古人，而且發生



黑死病：17世紀時代。

瘟疫的年代是1347年，正好與西歐文藝復興大瘟疫的年代大略相同。因此歐洲學者從19世紀中葉就提出這場瘟疫是從喀發所在的中亞地區（黑海與裏海地區）傳播過去的說法。不過根據加州大學的Mark Wheelis 的研究（2002），這個說法並不正確。

過去西方學者對伊斯蘭地區（或說東方，Levant）總有一種神秘的幻想，因此對於文藝復興時代殺死了幾乎一半人口的黑死病，很自然地想像說是從中亞傳來。文藝復興作家波伽丘

（Boccaccio）所寫的《十日清談》（*Decameron*），其中便收入了不少波斯、阿拉伯文學的神奇故事，使得它洛陽紙貴，膾炙人口。可見神秘的東方中亞在西方的人文想像裏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近代許多學者也說天花最早的紀錄見諸於印度和中國的文獻。我真是覺得究竟印度人或中國人是不是應該以此為傲。進一步說，現在歷史學者（2013）又提出黑死病的瘟疫早在第六世紀查士丁尼大帝時代就已經發生。再一次他們又「發現」這一類的細菌與現代中國天山以及中亞發現的細菌相同。

絲路上的確有千千萬萬各樣的事情在發生。我教中西文化交流史時常常講述諸如各種宗教、四大發明、鑄鐵、鑄鐵、劍鞘、長生的生物化學觀念等等如何在絲路



薄伽丘《十日清談》的中譯本。

李弘祺 專欄。

上輾轉傳播，不時感到興奮，而覺得人類文明因為交流而轉向壯大，這樣的事跡真是非常引人。然而，絲路上面也不斷傳播著各樣的病毒細菌，讓我們知道，人類都有相同的生理和命運。

我對於蒙古人把黑死病從雲南帶出來的說法原來是存疑的，因為歷史上的「疾病」，各地方的認定總會有不同，而且加上氣候的變遷，細菌或病毒的突變，很難斷定某一種歷史上的疾病就是現代醫學所認定疾病。加上中文文獻材料多待整理，很多人只是道聽塗說，很容易拿別地方相似的現象附會或比擬，因此給了它相當程度的可靠性。我個人認為存疑是一個比較可靠的態度。

中國和印度（再加上我們常常忘記的以色列）是歷史上比較早使用文字文明，因此各樣人類文明的創制或遇到的疾病都可能先出現在這兩三個文明的文獻記載。好壞都有。偏偏疾病或傳染病好像最可能出現在中印兩國，這恐怕不只是歷史的巧合吧！

中國「地大物博」而且人獸雜處，又喜歡吃什麼「野味」，所以經常會產生各種新生的病菌。對於這樣的文明特質，中國人學者每每愛用中國人相信「天人合一」，有極為深刻的「環境關懷」來加以美化。連我一向也相信這樣的說法。不過証之病理學的研究，則可以認為中國文化對於自然的想像及理想的堅持還是有一段路要走。

這一個世紀才不過五分之一，就發生了兩次從禽獸傳給人的瘟疫，這就不免使我漸漸相信近代醫學史指稱很多傳染病是發源於中國的說法，使我對上面鼠疫源於雲南的懷疑產生動搖。對於絲路上面可能流傳東西的種種生物，歷史學家實在有必要做更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李弘祺小檔案

1968 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